

## 艾田蒲与钱钟书

车琳

法国著名作家和汉学家艾田蒲（一译“安田朴”，René Etiemble, 1909–2002）被认为是当代西方最杰出的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学者。他对中国哲学和文学都有深入研究，把从事中法文化交流当作毕生坚持的生活道路和治学道路。1934年，他曾与留法诗人戴望舒<sup>1</sup>成为挚友，并翻译茅盾、丁玲、张天翼、施蛰存等现代作家的小说。如果人生多一些机缘巧合，艾田蒲和钱钟书（1910-1998）这两位年龄相仿、学术兴趣相近的青年才俊也许有可能在巴黎结识。可惜的是，当钱钟书1937年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偕同妻子杨绛抵达巴黎时，艾田蒲似乎大多数时日并不在巴黎，先是辗转到外省当了一段中学教师，接着远行到了美洲。后来，艾田蒲虽也曾到访中国，可惜与钱钟书一直无缘晤面。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事变动荡，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终于重新恢复了与西方的学术交流。1982年，艾田蒲在法国收到了第3期《中国文学》杂志，他通过其中《钱钟书与比较文学》一文发现了这位中国学者的比较文学观与自己的学术思想不谋而合，如融贯东西，在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中寻找共同的人性情感和文学规律等。艾田蒲对于中国同仁的学术成就肃然起敬，同时唏嘘感慨：“这恰是我30余年来竭尽全力而不得，一直向那些欧洲中心论者阐述甚至灌输的思想。”<sup>2</sup>于是，他兴笔在文旁空白处批注：“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新方向至关重要。”此时，他已经把钱钟书这位不曾谋面的中国学者当作自己的“知音”了。1985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会第11届会议上，艾田蒲发表了题为《论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的演讲，用五分之一的篇幅评述了上述文章，并欣然公开表示：“我们素不相识，但是在半个世纪中，一个法国人与一个中国人，我们共同致力于同一个研究课题并拥有共同的学术思想：我们是在同一条艰难道路上并肩行进的战友，而且达至同样的结论。”<sup>3</sup>此外，他还评论了钱氏巨著《管锥编》，称其中所揭示中西文学间会通之处不可悉数，并且也印证了他本人1983年《金瓶梅》法译本序言中表述的思考。艾翁了解钱钟书曾说过自己所从事并非比较文学，而只是运用了这个世界领域的一些研究方法，但是他依然十分赞同钱钟书关于比较文学的言论以及研究实践，而且充分认识到他对中国比较文学所作贡献，视之为领军人物，令人看到比较文学在中国复兴的希望。如今，以回顾的眼光来观察这30年我国比较文学的历程，中国学术界也普遍认为1979年《管锥编》的出版是一个重要标志。因此，我们不得不感慨艾田蒲英雄识英雄的慧眼，而且也要佩服他目光如炬，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了如指掌并充满信心。

到了1987年，法国Christian Bourgeois出版社同时推出了钱钟书先生两部作品的法文版，一是小说《围城》，二是文艺专著《诗学五则》。艾田蒲撰写书评《双重发现！》向法国读者推荐这两本不可错过的好书。这篇文章被艾翁两次选入自己的文论集——《通向一种全球性比较主义》（*Ouverture(s) sur un comparatisme*

<sup>1</sup> 戴望舒于1932年11月初赴法，1935年春回国。

<sup>2</sup> Etiemble, « Double révélation ! », in *Ouverture(s) sur un comparatisme planétaire*, Christian Bourgeois Editeur, 1988, p. 235; in *Nouveaux essais de littérature nouvelle*, Paris, Gallimard, 1992, p. 237.

<sup>3</sup> 同上。

*planétaire*, 1988) 和《世界文学新论文集》(*Nouveaux essais de littérature universelle*, 1992), 足见他对钱钟书的重视与推崇。对于《围城》, 他说这是恃才傲物的钱钟书独一无二的小说作品, 敢于拿中国传统婚姻作为创作题材, 值得大家“蜂拥抢购”。他在书评中着重介绍了《诗学五则》, 该书由法国学者、驻华外交官郁白(Nicolas Chapuis)选译自钱钟书的不同著作: 前三篇《中国诗与中国画》、《通感》和《诗可以怨》选自1985年出版的《七缀集》(由《旧文四篇》和《也是集》两部合编); 《宋诗》一篇选自《宋诗选注》第二版, 而《诗分唐宋》即《谈艺录》(1984年新版)首篇。艾田蒲首先推荐法国读者比较容易接受和理解的《诗可以怨》一文, 文中不仅举用南唐后主李煜诗作、韩愈的文论为例, 而且还援引雪莱、缪塞等西方诗人的诗句来说明“诗可以怨”乃是古今中外共通的文学主张。艾田蒲从这些旁征博引的文字中再次得到共鸣, 他在书评中写道: “尽管历史的偶然造成差异,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法国人, 大家都能懂得这些在几乎所有文学中都能发现的常量和不变因素正是说明种族主义愚蠢性的确凿证据。”<sup>1</sup> 他认为人们应当排斥的是种族主义观点, 而不是亚洲、非洲、阿拉伯这些欧洲以外的文学, 而且应该以合适的教学方法让孩子们从小学开始就接触到比较文学。接着, 他鼓励法国读者阅读《通感》一文: 钱钟书不仅从中国古代诗文和文论中来说明“通感”这种艺术手法, 而且追溯到古希腊荷马史诗和亚里士多德的《心灵论》来证明“通感很早在西洋诗文里出现”,<sup>2</sup> 到19世纪更为欧美现代派诗人所熟用。艾田蒲认为钱氏丰富的引文再一次证明“在东方诗学与西方诗学中不存在任何对立”, “数百年以来, 中国古代诗人就沉浸在他们和我们共同的通感中”。<sup>3</sup> 《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则介绍了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通感”, 而且在这一点上, 钱钟书依然从容自然地“打通”中西: “‘无声诗’即‘有形诗’和‘有声画’即‘无形画’的对比, 和西洋传统的诗画对比, 用意差不多。古希腊诗人(Simonides of Ceos)早说: ‘画为不语诗, 诗是能言画。’……”<sup>4</sup> 艾田蒲十分钦佩钱钟书博古通今、中西合璧的艺术素养, 竟然能够把西塞罗、达芬奇的相关言论信手拈来。在一个中国比较文化者的著述里, 他欣喜地发现他们声气相通, 那就是以宽阔的心怀和视野在各国文化和文学中的求同存异。在艾田蒲看来, 钱钟书为真正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贡献良多, 因此真诚地写道: “让我们感谢这位大师!”<sup>5</sup> 当然, 他最后也不忘呼吁法国读者去把《诗学五则》这本书“抢购一空”, 而且希望此书早日再版。正是由于像艾田蒲这样的重要汉学家的大力推荐, 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评论研究, 钱钟书作品逐渐受到法国读者和学者们的喜欢与重视, 被视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名著。

1988年, 艾田蒲集数十年精力所著中国和欧洲文化关系史两卷《中国之欧洲》<sup>6</sup>(一译《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 *L'Europe chinoise*) 得以出版, 该书以广阔的学术视野、深厚的学术功力和独特的批判精神得到西方学术界高度的评价, 荣获当年巴尔桑比较文学基金奖(Prix de la Fondation Balzan—Comparatisme)。从时间上推断, 一向能够以最快速度接触和阅读西文新书的钱钟书先生应当对艾田蒲的学术成就和理论有所了解。此外, 1990年3月, 艾田蒲被聘为中法比较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 钱钟书先生对此应当有所耳闻。然而此时, 他们都已是耄耋老人,

<sup>1</sup> Etiemble, « Double révélation ! », *Nouveaux essais de littérature nouvelle*, *op.cit.* p. 238.

<sup>2</sup> 钱钟书. 七缀集[M]. 三联书店, 2004(1985年第一版), 第71页。Cinq essais de poétiques, tr.fr.Nicolas Chapuis, Christian Bourgeois Editeur, 1987, p.112.

<sup>3</sup> Etiemble, « Double révélation ! », *op.cit.* p. 239-240.

<sup>4</sup> 钱钟书. 七缀集[M]. 同上, 第6页。Cinq essais de poétiques, *op.cit.* p.34.

<sup>5</sup> Etiemble, « Double révélation ! », *op.cit.* p. 240.

<sup>6</sup> 该书最早在1992、1994年由南京大学钱林森和许均教授译出, 而且前者早在1990年《中国比较文学通讯》第3、4合期中也发表过中译本序。

无论是行走还是通信都已不便。从杨绛所著回忆录《我们仨》的结尾之处我们得知，钱钟书先生晚年身体欠佳，著述不多，从1994年开始便住进医院，直到1998年岁末去世。<sup>1</sup>因此，我们很遗憾地尚未发现任何钱钟书评述艾田蒲或者记述二人之间交往的文字。

作为晚辈学人和旁观者，我们可以从这两位令人高山仰止的学术大师身上看到许多相通之处。首先从个人禀赋上来看，艾田蒲和钱钟书都可以说是自幼聪颖，喜好读书，而且具有语言天赋和博闻强识的才能。从所接受教育来看，他们首先都拥有深厚的本国文学、文化素养，钱钟书先生少年开始熟读诗书，国学基础笃实，1929年被清华大学外文系录取，1935年又以第一名成绩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赴牛津大学英文系留学，其学问体系可谓中西合璧。而艾田蒲先生虽家境贫寒，但少时便喜欢在阁楼上寒窗苦读，大学时学过哲学，并且很早就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于是师从法国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受益颇多，对中国古代经典及近、现代文学无不精通，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家。另外他们都很早形成自己的学术兴趣：钱钟书在大学期间建立会通中西的学术观念因才华出众而受到罗家伦、吴宓、叶公超等老师欣赏，被视作殊才；艾田蒲自称在年幼时便有意识成为比较文化学者，用了30多年终于修成正果。而且，作为一个优秀的比较文化、比较文学学者，他们都有意识地学习多门语言。钱钟书先生能够阅读多门欧洲语言，所以才能在学术研究中引经据典、博采众长；而艾田蒲先生熟稔十几门语言，甚至是一些非常偏僻的稀有语种。当然，最能够在两位学者身上产生共鸣可能性的是相同的学术理路。艾田蒲对比较文学学科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早在1963年的重要学术论文《比较不是理由》中提出“比较诗学”概念，<sup>2</sup>所谓法国派影响研究和美国派平行研究应当相互结合和补充，在世界文学中寻找属于一切文学美的“永恒不变的东西”；二是提倡突破欧洲中心论，反对以西方思想意识来贬低非洲文学、亚洲文学或美洲印第安文学等，实现真正的总体文学。钱钟书先生虽然不以比较文学为己任，但是也曾提出类似观点，客观上极大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学界评价他的治学方法就是“打通时代、学科、国别、语种以至文化系统等壁垒”，<sup>3</sup>搜集古今中外的相同相通的资料，在参互比较中求文学的共同规律，即寻求共同的“诗心”、“文心”，正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sup>4</sup>从某种意义上说，钱钟书先生曾经在80年代初与学者张隆溪的谈话中呼应过艾田蒲关于“比较诗学”的学术设想，他认为“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认识总体文学乃至人类文化的基本规律，所以中西文学超出实际联系范围的平行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极有价值的。这种比较惟其是在不同文化系统的背景上进行，所以得出的结论具有普遍意义。……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即所谓比较诗学、是一个重要而且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sup>5</sup>而且，他本人在治学经历中也一直践行着这种理念和方法。由此可见，在相同时代、不同空间里，两位学术泰斗在基本学术思想上确实不谋而合。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不仅都是批评家，而且也是作家，都创作过诗歌、小说，他们的文字都是文理并茂，妙趣横生的。总之，两位宗师或许不曾谋面，但是这并不妨碍二者之间的精神会通。这段鲜为人知的神交给与我们很多启示，为我们提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又一则精神会通的范例。他们的学术成就成为永传后世的精神遗产，他们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学术

<sup>1</sup> 杨绛. 我们仨[M]. 三联书店, 2003, 第165页。

<sup>2</sup> Etiemble, « Comparaison n'est pas raison », in *Ouverture(s) sur un comparatisme planétaire*, op.cit.p. 136-138.

<sup>3</sup> 《钱钟书作品集》，<http://www.eywedu.com/Qianzhongshu/index.htm>（2010年3月7日）。

<sup>4</sup> 钱钟书. 谈艺录[M]. 中华书局, 1998, 序, 第1页。

<sup>5</sup> 张隆溪. 钱钟书谈比较文学[J]. 读书, 1981(10)。

素养更是后辈学人们努力学习却难以超越的榜样。